



东西问

中新社北京1月2日电:为何说中国为世界提供了“另一种制度选择”?

——专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

作者 刘文文 尹倩芸 王梦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发展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贸易国,人均GDP也从不到300美元提升到超过12000美元,迄今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中共十八大以来,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诸多奇迹。

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今一些国家深陷治理危机,社会矛盾不断加剧,政治经济面临巨大不确定性。为何会出现这种反差?为何说中国为世界提供了“另一种制度选择”?近日,中新社“东西问”就此专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在最新著作《中国叙事: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中提到,西方自身所面临的问题和中国

郑永年:为何说中国为世界提供了“另一种制度选择”?

可持续崛起,导致了西方对中国经济制度的恐惧。在同一波全球化过程中,为何会出现这种反差?中国制度令人“恐惧”吗?

郑永年:这主要在于西方自身存在的治理问题,也就是其收入差距扩大导致社会高度分化。全球化导致了资本、技术、人才在世界范围内相对自由流动,一些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从中获得了巨大财富。但极少数国民收获了全球化的绝大多数好处,大量的中产阶级没有从中获益。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中产阶级一直萎缩,占比从原先的65%降低到现在的50%左右。

实际上,全球化对中国也产生了同样的影响,但我们的制度有自身优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发展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用40年促成8亿多人口脱贫,迄今为止中等收入群体已超过4亿人。全球化对我们的收入差距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我们通过制度优势、精准扶贫,保证了基本的社会公平。

中国是少数几个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同时实现三个可持续发展的国家之一: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可持续的社会稳定、可持续的政治制度支撑和领导。中国同时实现了这三方面的进步,并将此扩展

到国际层面,所以少数西方国家对华产生“恐惧感”。公平地说,西方的经济、科技还在发展,但由社会分配不公所引起的问题到今天仍未解决。

中新社记者:近年来一些西方人将中国视为“国家资本主义”。这一观点为何站不住脚?

郑永年:近代以来,各国多多少少都具有某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政府都承担某一种经济发展的功能,只是干预程度不同。事实上,美国也是某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比如1945-1970年的凯恩斯主义就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现在的拜登政府也在干预经济。相比美国而言,中国多了一个国家干预经济的工具——国有企业。美国虽没有国企,但也通过军工系统来执行其产业政策。

西方一些人将中国简单地视为“国家资本主义”,主要是因为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因而把中国看成威胁,在这里有意识形态的成分。事实上,国家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最早是列宁提出的,主要指计划经济,只存在国有资本,还有为国家贡献了56789(即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的民营企业。

事实上,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混合经济,中国文明很早就把私有制跟公有制结合起来。比如古代的井田制,以九百亩为一

“井”,将其平均分为九块,每块一百亩,中间一块为公田,周边八块为私田,就是将私有和公有混合在一起。

中新社记者:您在新书中提到,与西方的政治经济分离不同,在中国,经济从来就是国家治理的一个有效手段。中国提供了怎样的“另一种制度选择”?

郑永年:在西方,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崛起和发展,经济逐渐从社会的诸领域中独立出来,把自己和社会隔离开来,最后发展成为今天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形态,强调经济的自主性,反对政府干预。政治和经济的分离既是西方经济发展的根源,也是社会问题的根源。

而在东亚文明中,不论中国、韩国或新加坡,经济活动从来就被定义为政府责任的内在部分。从中国历史上看,国家一直肩负着管理经济的责任,大禹治水的典故、从古至今流淌的大运河以及如今的高铁“名片”都说明了这一点。近年来中国快速崛起、中国超大规模的基础设施等也充分证明了中国制度的有效性。

今天西方资本主义面临资本坐大、政府跟市场失衡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核心就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西方也在反思自己的制度,“拜登经济学”的核心尽管仍在资本主义的范畴里,但更多地强调如何发挥政府的作用,通过各种方式保护弱势群体,保护中产阶层。

美国市场的民间也在呼吁政府发挥作用。

如今,围绕中国政府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来叙述中国的经济制度,阐明存在“另一种制度选择”,并非要取代西方的体制,而是为世界多提供一个参考体系。

中新社记者:自近代以来,中国与世界经济互动、接轨,逐渐成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如何理解“中国问题世界方案”和“世界问题中国方案”这两句话?

郑永年:这个问题是永恒的,自近代中国开始与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发生关系以来,“中国问题世界方案”“世界问题中国方案”就都存在着。

清王朝灭亡后,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曾尝试过西方式的多党制、总统制、议会制,在多次失败后重新寻找学习榜样。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所以共产党的成立本身就是中国问题世界方案。又如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也是中国在向世界寻找方案。

中国近代以来很长一段时期都走了中国问题世界方案的路,随着近些年



郑永年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迅速崛起,世界问题中国方案逐渐成为新的趋势。比如消除贫困是中国的也是世界性的难题,中国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方案;此外还有“一带一路”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等中国方案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问题世界方案”中,中国不是照搬照抄别国经验,而是强调“世界方法的中国化”。同样,在“世界问题中国方案”里,中国也不是把自己的方案、逻辑、制度强加给他国,而是提供一种选择。

这与中国文明的特质有关。中国文明是包容一切的世俗文明,讲究和而不同。同时中国文明也具有“一贯性”,能够吸收消化其他文明的长处,把它们变成自己文明的一部分,生生不息。



于洪君

中新社北京12月14日电 作者 于洪君 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

2023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5周年。45年来,中国对内全面深化改革,对外持续扩大开放,不仅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新经验,同时也使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显著提高。如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发展时期。回首过去,着眼现实,展望未来,对中国对外开放事业,可以得出如下几点基本认识。

第一,对外开放使“中国需要世界”与“世界需要中国”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新中国成立之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大都采取对华孤立和封锁政策。受当时国际环境制约,中国在对外关系方面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对外交往与合作,只能以社会主义国家为主。虽然毛泽东主席提出了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学习外国先进经验、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等重要思想,但外部环境

于洪君:中国对外开放之路,不是来而不往的单行道

不允许,打开国门搞建设的良好愿望无法实现。

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发生分裂,中国对外交往与合作的选择余地相当有限。后来,随着国际环境愈加复杂和严峻,只能实行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发展方式。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工作后,全面而客观地分析了国际力量对比和世界发展大势,得出了“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等科学认识和结论。

依据这些新的认识和结论,中国共产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轨道的战略决策。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与日本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与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全面调整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也正是从这时起,各种级别和类型的代表团纷纷出国,一批批专家学者到国外进修。境外的资金、技术、人才、产品、设备以及现代经济理念、管理手段进入中国。

对外开放后,中国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豁然开朗。对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特别是对发展差距的了解越来越全面、清醒、理性。同样,外部世界对新中国了解,总体上看,也越来越客观、务实、包容。“中国需要世界”的新理念开始被中国社会广泛接受,“世界需要中国”的新认知也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第二,对外开放使“中国走向世界”与“世界走向中国”成为时代进步的突出特点。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西方国家曾经利用苏联剧变和中国改革中遇到的困难,实行所谓对华制裁。面对严峻局面,中国既坚持改革开放基本路线不动摇,又实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方针。进入21世纪后,中国成功加入了世贸组织。持续开放的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也因此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参与全球治理、变革国际格局的力量源泉。

随着综合国力迅猛增长,中国的国际处境持续改善,对外开放的意志和决心进一步增强。中国不但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防扩散国际合作、国际反恐斗争、打击国际水盗、国际人道主义援助行动以及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同时还积极参与新一轮南南合作,成为引导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

中国持续扩大对外开放,获得了促进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有效融合的宝贵机遇,同时也获得了在全球范围内拓展发展与安全利益的广阔空间。世界各国在中国找到了巨大的投资场所和消费市场,获得了超越制度分歧与价值观念差异而共谋发展的现实前景。“两个需要”与“两个走向”此呼彼应,相互促进,成为冷战后世界发展进

步的突出特点,也成为国际关系发展变化的重要引擎。

2012年中共十八大召开时,中国经济总量和进出口总额已居世界第二位,外汇储备已居世界第一,吸引外资多年处于世界前列,对外投资和企业走出去的规模进一步加大。中国已成为影响世界发展大势和国际力量对比的重要因素。在此形势下,中国也不断向世界传递信息:我们的对外开放,绝不仅仅是来而不往的单行道,而是与整个世界全面联动的双向道。

第三,对外开放使“中国影响世界”与“世界影响中国”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中国需要世界”与“世界需要中国”成为国际社会新共识,“中国走向世界”与“世界走向中国”成为国际关系新常态的时代背景下,中国通过自身发展深刻影响世界、世界因为剧烈变化而影响中国,自然而然地成为势不可挡的历史发展大势。

但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从来都是曲折而复杂的,对外开放之路并非一片坦途。受意识形态差异、发展模式竞争、地缘战略博弈、大国关系复杂化的影响,质疑和否定中国对外开放的声音时有出现。有鉴于此,中国领导人明确表态,将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敞开大门搞建设。

尤其在欧美国家的金融危机及全球、反全球化逆流汹涌来袭的背景下,中

国坚守在开放中谋求共同发展的既定国策,公开承诺积极营造宽松有序的投资环境,放宽外商投资准入,建设高标准自由贸易区,加强产权保护,促进公平竞争,让中国市场更加透明规范;大力建设共同发展的对外开放格局,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构建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网。这令国际社会切实感受到,中国的大门向世界始终是敞开的。

2017年中共十九大召开时,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中国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此后,中国实行了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加快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中国成为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货物贸易总额居世界第一,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居世界前列,形成了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

第四,对外开放使中国“与世界同行、与时代同步”成为绝不动摇的坚定选择。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世界经济复苏动力不足,促进复苏需要共识与合作。中国坚持对外

开放的基本国策,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推动各国各方共享制度型开放机遇,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

建设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对外开放,必然是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要依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的独特优势,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效应,对内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高度统一的营商环境,对外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通过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推进新型经济全球化,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

未来的对外开放自然也包括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等方面的内容。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展示中华文明精髓,构建中国话语及叙事体系,树立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也将成为中国与世界同行、与时代同步的重要内容。

显而易见,无论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还是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都要通过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不断深化互利合作领域、不断深化共赢合作的伙伴关系来推动落实;都要通过共同营造有利于发展的国际环境、共同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扩大中华民族与人类社会根本利益的汇合点来实现。在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的道路上,我们还要做出更多探索和努力。